从台湾问题看清代海权意识的觉醒

□何　瑜

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从海上来的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给闭关自守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在外患频仍、创巨痛深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他们大声疾呼加强海防，研究退敌御侮的办法。著名将领林福祥在《平海心筹》中认为，海防应“以战为守”，主张利用清军现有装备，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火器，在海上以火攻制敌。林则徐则先是主张对入侵者“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其后又提出，“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他的挚友魏源更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论，冲破了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是自施琅提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这一海防思想之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成为其后清朝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可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清统治者的重视。之后同治六年（1867），藩司丁日昌鉴于东南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新式海军之建议，将东南沿海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大军区。第二年，他在《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又倡议改江南水师提督为海洋提督，并把提督驻所由厦门改为台湾，这种将台湾置于东南海防突出地位的战略眼光，尚难以被时人理解，故上述建议均未被清廷及时采纳。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后起的日本侵略者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的时候，清朝统治者才如梦方醒，中国的海权意识和海防措施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　他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故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在创建中国近代海防的同时，清廷的治台政策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防台以靖海疆变为保台以御外侮；从抑制台地的发展到全面开发和经营台湾。当时，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筹划台湾“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吓”。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人亦意识到，“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从此，朝廷上下对台湾在中国海权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法国为鲸吞全越，将战火烧向中国的西南边陲。第二年七月，法国侵略者悍然进攻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接着，法军进犯台湾，陷基隆，攻淡水，然后封锁台湾海面，台湾受困，牵动全局。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清廷借冯子材等人率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形势，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了《停战条件》。

中法战后，中国十几年的海防建设遭到沉重打击，人们痛定思痛，于是再次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陈奏。

李鸿章认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主张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综理其事，以筹全局而专责成，下辖水师四镇，“平时分防汛地，建威销萌；有事合力通筹，声势联络”。左宗棠则主张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建立十支海军，以夺取制海权，并在病逝前一月上言：“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

同年九月，清廷先是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接着又明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将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并从财政和人事上积极支持首任巡抚刘铭传筹建台湾省。这两大举措，一方面说明清廷对台湾在整个东南海防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即欲守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台湾；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海防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台湾首抚刘铭传在保卫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海防和海洋军事建设，先后兴办台湾军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等，以解决台地兵器修理和制造的难题，并于台、澎海口要隘之处修筑近代化炮台，配备新式的阿马士敦后膛炮及各种水雷；另一方面则“与敌争利”，从海洋经济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台湾岛。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的同时，先后定购和集资购买了8艘轮船，开办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之间，有时亦航往吕宋、西贡、新加坡等地。为与列强争夺海洋利权，刘铭传不仅苦心经营台湾航运，而且积极建造台湾铁路，创设台湾邮政局，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线，敷设从台湾至大陆的海底电缆。从开辟海上运输、海上邮政，到建设台湾铁路、铺设海底电缆，说明近代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已从加强海洋国防，捍卫海洋国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升华到重视和发展海洋经济的历史阶段。

中日甲午战后，虽然中国北洋水师覆灭，台湾被日本割占，但中华民族的海权观念和海洋意识的觉醒，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和迅猛。

China 中华春秋

“笑里藏刀”的李义府

□巫　唐

形容奸险小人常用的“笑里藏刀”、“口蜜腹剑”那两个成语，典故都出在唐代。“口蜜腹剑”的是李林甫，“笑里藏刀”的是李义府。这两个人都曾官至宰相。

人是小人，但李义府做诗文的本领着实不坏。《大唐新语》指斥张怀庆生吞活剥，举出的证据就是剽窃了李义府的诗。李义府踏上仕途，也靠这项本领。

李义府自小乖觉伶俐。20多岁时刘洎、马周等极力荐举他，于是唐太宗予以召见，并以皇家园林里的鸟为题让他吟诗，李义府马上吟道：“日里飏朝彩，琴中闻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言外之意，太宗自然明白，笑笑说：“给你一整棵树都行，何止一枝呢！”就给了他一个门下省典仪的官，又升监察御史，并在晋王府兼职。

与《水浒》中的高俅一般，李义府这样的人运气偏好得出奇，晋王李治升为太子，后来即位为高宗，他跟着一路加官晋爵。他极力促成立武媚娘为皇后，又攀上一根高枝，由此更得重用，此时的身份，其实已是宰相。

大权在握的李义府仍然“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嫱怡微笑”，但他心胸狭窄而且一肚子坏主意，稍有不合，马上陷害对方，他“笑里藏刀”的作派真是路人皆知。有人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李猫”，意思是他外表柔顺而暗藏杀机。

李义府还贪恋美色。有个淳于氏姿色出众，犯罪下狱，他吩咐大理寺丞毕正义把她弄出来做情妇。事情败露，毕“畏罪自杀”。御史王义方上了一道弹劾的奏疏，指控李义府杀人灭口，并揭露了李的许多秽行，说他仗着皇帝宠信，坏事做尽。唐高宗不去问李义府之罪，反而把王义方贬逐出京。李义府兴灾乐祸地问王义方：“王御史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难道不惭愧么？”王义方回答说：“孔子做鲁国司寇七天，就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而我当御史十六天，却不能去奸除邪，确实觉得惭愧啊！”话虽如此，毕竟无奈李义府何。

不久李义府又升任中书令，进封河间郡公，家里已去世的父亲、襁褓中的小孩都有官做，益发气焰嚣张，干脆和母亲、妻子、儿子、女婿大搞卖官鬻狱的“一条龙”产业，这种生意岂有不门庭若市的道理！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看不惯老下级爬到自己头上，两人在高宗面前吵了起来，结果被双双贬为刺史。不过第二年，李义府就官复原职了。

李义府改葬祖父，好些地方官拍他的马屁，征召人夫、车、牛载土筑坟，昼夜不息，其中有个高陵县令张敬业，干得太卖力，竟然累死在工地上。李的祖父改葬之日文武百官争相送礼，各种器具、用品都极尽奢靡，车马、供帐摆了七十里，从唐高祖李渊以来哪位王公的葬礼也没有这样豪阔。《红楼梦》里秦可卿的葬礼也算大排场了　相形之下，无异小巫。

如此胡作非为，连高宗有一回也终于忍不住劝他：“听说你儿子、女婿都不谨慎，罪过很多，我都替你压下来了，没有拿到朝堂上公开。你回去教育教育他们，不要老这样干。”李义府听了勃然变色，腮帮子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反问高宗：“是谁和您说了这些？”高宗说：“这也是我的意见，你又何必问我怎么知道的呢？”李义府当然不能报复皇帝，但也不肯认错，依旧踱着方步去了，高宗也拿他没办法。

不过李义府没想到，后来一个小小的由头居然就把他扳倒了。事情是这样的，李义府找阴阳师杜元纪来望气，杜说他的府第有狱气，要拿出二千万钱来才能化解，李义府听信此言，聚敛更急更狠，卖官业务做到了上门推销的程度。他利用为母亲服孝的“哭假”，与杜元纪出城登古冢候望。有人抓住这个把柄，告发他“窥觇灾眚，阴怀异图”。司刑太常伯刘祥道等人负责审理，又查出许多罪证来，于是高宗下诏，给李义府定了卖官、渎职、结交阴阳师、轻慢哀礼等罪名，长流嶲州（今四川西昌）。消息传出，朝野相庆，有人还写了一篇游戏文章《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在大路上。

过了两年，高宗改元乾封，大赦天下，李义府赶紧写了一首《在嶲州遥叙封禅》献上。诗写得很卖力，辞藻富丽、音韵铿锵，但没产生效果，因为赦令规定：长流人不许还。李义府气急败坏，忧愤而死，年五十余。他被流放后，许多朝臣还时常担心他卷土重来，现在听说他死了这才安心。

History 史镜

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业

□王宏甲

20世纪初，中国涌现的报业，是与西方工业浪潮对中国的冲击和洋务运动中发展出中国近代工业相联系的。当时办报刊最多的城市，首推北京和上海。

洋务运动之前，中国最早的工人已经出现在洋人在华兴办的企业里。如19世纪40年代，英国商人在香港创办了阿白丁船坞，那里出现了最早的华工。同时期，还有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办的“花华圣经书房”、英国商人在上海办的“墨海书馆”。这里所称的“书房”、“书馆”，都是印刷厂。这事迹也告诉我们，当一种新经济出现，印刷业和报业、书刊业，是最早繁忙起来的产业之一。

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工业，最早的当是1852年在上海出现的一家船坞，以修理外国轮船为主业，业主是广东人郭甘章。自1861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了洋务时期最早的军用工业。1866年民族资本家方举赞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是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民族机器工业。到19世纪末，中国的工业除采矿业外，基本上集中于沿海和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上海最多。

北京的近代工业晚于江南等地的工业。到1888年，清廷在西苑（今中南海）建电灯公所，专供皇宫使用，是北京电力工业之始。1895年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到北京丰台，京师始通火车。1898年清政府正式成立大清邮政并办京师大学堂。

进入20世纪，清政府于1901年被迫与英、美、俄、德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西方商品潮水般涌入京师市场，北京出现了几百家洋货店或附设洋货的店铺。在清政府过去严禁设立店铺的北京内城也出现了新的商业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王府井八旗神机营的练兵场，逐渐发展为东安市场。

可以说，是国内外新兴的工业生产力，迫使慈禧太后在1901年下了“变法诏”，表示要“实行新政”。1902年7月，中外合拍了第一部纪实电影《慈禧太后》。1904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发行纸币，并为发行纸币开设纸厂和印刷厂。现代银行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商业和民族资本实业的发展。自1904年起，京师民族资本陆续办起了纺织厂、织布公司、卷烟厂、面粉厂、毛织厂、呢革厂、自来水厂、玻璃厂等等。1905年后，为经营铁路、电报、邮政和航运，京师又有了官商合办的交通银行。在诸种新兴的产业中，报业是直接与文化相联系的极重要的实业。

北京最早的民办报纸是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编辑的《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1896年，《苏报》在上海创刊。进入20世纪后，1901年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同年底，上海还创办了《及时行乐报》，是一张“消闲”性质的小报，使报纸开始往“通俗”的方向发展。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首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中国人。1903年《科学世界》、《绣像小说》在上海创刊，同年12月19日林白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白话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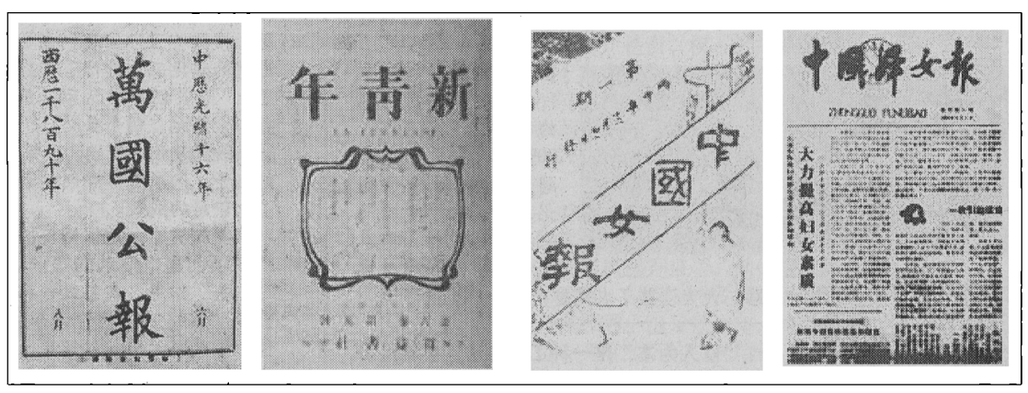
1904年3月，陈独秀在昔日曾国藩创办了洋务运动第一个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的安庆，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同年8月，《京话日报》在北京问世。

所谓“京话”就是“白话”。这些最早使用“白话”写作的报纸，算得上是20世纪的早期最有创新意味的报纸，对中国历史上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冲击，是20世纪中国采用白话文的先声。

这一时期北京的民办报纸还有《乌言报》、《宪法白话报》、《中华报》、《北京时报》、《北京日报》、《京都日报》、《帝国日报》、《国报》、《宪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等等，还有八旗子弟办的以旗人为主要读者的《中央大同日报》。诸多冠以“国”字的报纸，其实是民办的报纸，是与民族现代印刷业一同发展起来的报业，显示了民间力量、产业力量在创造一个新经济时代的伟大力量。

也在1904年，清政府于7月28日设立了官报。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在较快发展，以铁路为例，1905年以詹天佑为“总办”的京张铁路开工，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907年京奉铁路全线通车，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各种新事物的出现是激动人心的，也吸引了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热情投入，如鲁迅著出的第一本著作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与人合著的一部《中国矿产志》，那是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1906年5月11日出版。那时“鲁迅”这个笔名还没有诞生，作者署名为顾琅和周树人。胡适则在1906年当过《竞业旬报》的主笔，这一年他15岁。



1911年清朝覆灭后，北京的报业涌现出一个办报高潮，一时间报纸多达50多种，占全国报刊总数的九分之一，居第一位，其中以妇女为主要读者的就有《北京女报》　《女学日报》　《女子白话旬报》等。

当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在中国出现，报业对推动一个民族经济的更新，对促进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作用是巨大的。1904年，当北京出现《京话日报》时，胡适13岁，郭沫若才12岁。是报刊使用“白话”10余年后，培养了一代青年读者，影响和准备了一代渐渐觉醒的民众，才发生了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的文学革命，乃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11年，中国的产业工人约有60多万人。到1919年，增加到200多万人。发展最快的第一是纺织业，第二是面粉业。中国从面粉输入国变为面粉输出国。只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看祖国，就会看到，即使是在灾难深重的年代，中国仍在进步。在历史岁月中，那些曾经为中华进步做出不懈努力的人们是很多的。看见这些，我们就会对生产力进步推动思想解放、文化进步、文学发展留下深刻印象，会对许多我们不知其名的先人满怀尊敬的心情。

Thinking 有所思

“权利”视野下的国家：人文主义的政治理念

□孟广林

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发与流播，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演进更新的态势。在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下，人文主义者以新型的“人本”观为思想武器，在批判中世纪封建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现实的人的“权利”为始基点与归宿点，构建起了人文主义的“共和政治”观与“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将人文主义反神权、反封建的新政治理念渐次清晰地展示出来。这一顺应时代发展之要求的政治理念，开启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端绪。

在封建时代的西欧，受天主教神权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支配，社会成员被划分为教士、贵族与劳动者这三个等级，分别从事“拯救灵魂”、保卫国家与社会生产等不同的职责。而在政治生活中，只有高级教士与封建贵族才享有参与国家政务的政治特权，大多数人绝无任何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可言。与此相应，教会从“神本”观出发，鼓吹“王权神授”的学说。他们声称，国家从来都是神所设置的统治机构，国王则是上帝“授权”的“神命”之君。人人都须尊崇和服从君主，否则就将受到上帝的惩罚。随着罗马教廷神权的膨胀，教皇的御用神学家进而鼓吹“教权至上”的“双剑”论，声称上帝将象征着宗教神权的“灵魂之剑”与象征着世俗权力的“物质之剑”都授予了教皇，教皇留下前者来统治教会，而把后者转授给君主，王权必须服从教权。这些带有宗教蒙昧主义之浓厚色彩的神权政治主张，将神意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根本源头，强调对君主与教会的绝对服从。这样一来，在神权政治思想的阴霾中，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定格成神意的奴仆，人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变成了神坛上的可悲祭品，只能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宰割。到了中世纪的后期，随着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之斗争的兴起，封建的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日益受到有力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文主义的反神权、反封建的政治理念破土而出。

“共和政治”观是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是一些服务于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的人文主义者。在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曾经在共和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所谓“市民人文主义”者，如萨琉特蒂、布鲁尼、阿尔伯蒂等人，在反对米兰独裁大公的侵略扩张政策时，倾吐了“共和政治”的理想。他们认为，所谓的“神命”的君主制其实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君主的专制独裁，既剥夺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压抑了公民的进取精神，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无能的奸佞之臣，致使国家丧失了发展繁荣的动力。他们声称，共和制是最佳的政体，因为它确保了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主平等地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使公民享有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布鲁尼还撰写著名的《佛罗伦萨颂辞》一文，将佛罗伦萨的发展繁荣归功为它的共和政治体制。在威尼斯，15世纪初的人文主义者威尔吉雷奥发表《威尼斯共和国片论》一著，醉心于颂扬威尼斯的共和政治体制。到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吉安诺特蒂的《有关威尼斯共和国的对话》一著更是则对此大加褒扬，认为威尼斯所建立的最优良的共和制度，确保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完整的社会正义，并实现了在各利益群体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一致。这种颇有夸张色彩的“威尼斯神话”　在当时的西欧不胫而走，四处传播。

在当时，与“共和政治”论者相反，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则主张实行“开明君主专制”，并将之作为国家稳定发展、社会进步繁荣的根本保障。在这一政治构想中，他们反对“教权至上”与分裂割据，主张实现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国家统一与社会和平。在14世纪初的意大利，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就指出，内部分裂必然导致国家毁灭与社会动荡，要结束内乱，实现和平，就必须消除教权干预王权的局面，实现政教分离由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统治。彼得拉克对社会内乱纷争深感痛心，认为只有君主专制才能确保天下太平。因此，他在《治国术》一著中指出，实行君主专制是必要的，因为“在没有专制君主的地方，人民就像专制君主那样行动”。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更是其后继者马基雅维里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在《君主论》一书中，他呼吁由君主摆脱神权的控制，推行强权统治，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将意大利从四分五裂的崩溃边缘上拯救过来。他甚至主张，君主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应当兼具狮子的凶猛与狐狸的狡猾，可以不择手段地采取任何措施。在16世纪后期的法国，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著名学者波丹，在其所著的《国家论六卷》中，通过对国家“主权原理”的阐发，从理论上论证了强化王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在倾吐“开明君主专制”理想时，主张反对封建暴君政治，要求君主戒贪去奢，尊重民众的自由与尊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在《论世界帝国》一著中，但丁要求君主充分尊重民众的自由，顺应民情民意，因君主及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在《治国术》中，彼得拉克告戒君主要切忌贪残、奢侈与荒淫等“违反人性”的恶行，因为这将引起公愤，而“被人民仇视则是毁灭的根源”。为给自己的统治“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君主要公正仁慈，克勤克简，尤其要注重确保民众的财产权，鼓励私人勤奋致富。波丹在倡导专制君权时，也要求君主受“神法”和“自然法”的约束，例如在课税上，必须根据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切戒进行违反“自然法”的滥征。此外，彼得拉克等人文主义者还要求君主尊重知识与人才，关心社会公益，讲求行政效率。所有这些有关政治“开明”的界定，都赋予了长期延续的君主制以新的时代特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政治理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怀旧”的情结，打上了“君权至上”的传统烙印。同时，其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实际上并未超越资产阶级的权利范畴。然而，无论是“共和政治”观还是“开明君主专制”论，人文主义的政治主张都突破了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禁锢，显示出一种新的“人本”价值取向，即从现实的人的“权利”视野去审视国家，进而挺立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鼓倡人的“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乃至神圣的财产权利。这样的政治理念，实际上已包纳着朦胧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之深层意涵。它的问世，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近代早期西方人的政治理性与政治觉醒，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历程

欧洲文艺复兴